兩個青年

蘇 北

八十三年前，在法國巴黎的一條叫奧德翁的路上，有一家叫「莎士比亞之友」的租書圖書館。一個上唇留着濃密鬍鬚的青年經常光顧這家不大的、但十分友善的圖書館，這個青年就是後來名聲顯赫的文學家歐內斯特·海明威。同樣，在八十三年前的北京，在一個自稱叫「窄而霉小齋」的小旅館的一個房間裡，有一個來自湘西的小個子青年，一邊流着鼻血，一邊在寒冷的沒有火盆的房間裡寫作。這個小個子青年，就是「只有小學文化，硬是靠自己的一雙手打下一個天下」的沈從文。

在一本叫《流動的聖節》和《從文自傳》的書中都可以找到他們年輕的、充滿熱情的，而又是苦悶的青春歲月的身影。海明威生於一八九八年，一九二一年二十三歲的海明威在美國小說家舍伍德·安德森介紹下以《明星日報》駐歐洲記者的身份來到巴黎，住在勒穆瓦納主教街七十四號的一間寒冷的屋子裡，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。因爲寒冷，海明威通常到咖啡館去寫作。而同樣在一九二二年，沈從文由於在熊（希齡）公館接觸到林紓譯的狄更斯小說和閱讀新文學書刊，受了《新潮》等刊物的激勵，二十歲的沈從文在苦苦思索了數天之後，便懵懵懂懂來到了北京，在寒冷和飢餓中學習寫作。海明威不是有這樣名言嗎？他在《流動的聖節》中是這樣說的：在你不得不規定自己只吃個半飽的時候，必須控制住自己，不要老是想肚子有多餓。飢餓是有益的磨練。

也是，伊壁鳩魯不是說過嗎：歡樂的貧困是美事。

這兩個青年，他們是幸運的。他們在青春歲月便來到了文學藝術的中心。不可想像，如果一直蜷居在湘西的小城鳳凰，沈從文會是什麼樣子，也許是個會計，也許是個稅務員。他們的幸運還不僅僅是這些，他們從青春歲月的開始，便專心致志一門心思地寫作，二十歲到三十歲是人生多麼重要的時光。沈從文自己說過，一個人寫一輩子小說寫不好才眞是怪事。他們當然也遇到了一生也不會忘記的引路人。海明威遇上了格特魯德·斯坦因，遇上了莎士比亞圖書館的主人西爾維亞·比奇；沈從文遇上了徐志摩和郁達夫。

不要相信有什麼天才啊。我親耳聽沈從文自己說過，我是一個相當蠢笨的人。沈從文說他自己就是「耐煩」。我能想像得出那個憂鬱的青年小小的身體伏案寫作的樣子，而海明威的飄動的身影，則永遠留在巴黎聖米歇爾廣場上的那家雅致的咖啡館裡。他自己說，不要着急，寫上一句你所知道的最眞實的句子。又說，剔出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，從第一句簡單而眞實的句子開始往下寫。他們就是這樣寫下去的，一切並不如後人傳說的那麼神秘。他們就是用這樣「簡單愚笨」（沈從文語）的方式，在孤獨寂寞中寫下《邊城》、《湘行散記》、《老人與海》、《乞力馬扎羅的雪》和《弗朗西斯·麥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》等膾炙人口的名篇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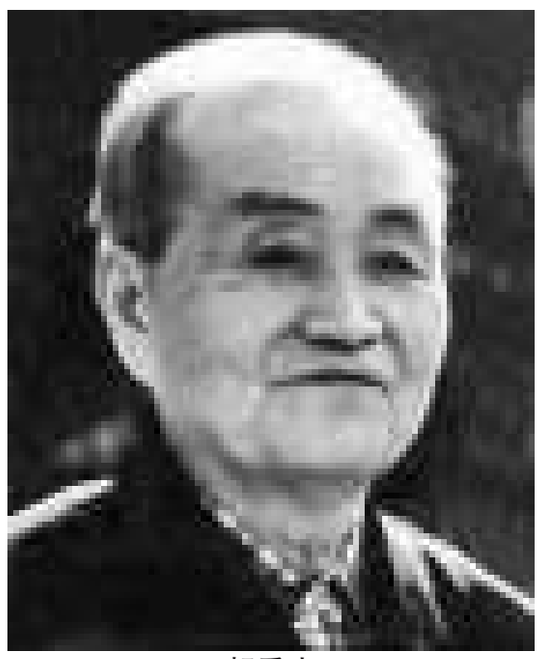
想想眞是奇怪，他們膚色不同，民族不同，所運用的語言不同，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走向世界，因爲他們筆下的人物有共通東西：人，人性；美。

可生命總是脆弱的。半個世紀後，兩個青年經歷了各自的命運的播弄，雖然他們的事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他們都走進了歷史。然而由於種種原因，中國的這個老人，寂寞，苦悶，無助，幾次割腕自殺，大洋彼岸的那個老人乾脆用自己心愛的獵槍打掉自己的大半個腦袋，結束了戲劇性的一生。

可他們的生命是璀璨的。正如朴樹唱的《生如夏花》。

其實，六十年之後，也有一個青年步着兩位之後塵，來到北京，住在潮濕而骯髒的筒子樓裡，在布滿蟑螂的小屋裡學習寫作，可是這個青年就沒有這麼幸運了。這個青年是誰，我想不用說讀者朋友也會明白的。

巴黎是藝術的起點，同樣北京也是。



胡喬木

穆旦老年的囈語

王 彥

提及詩人穆旦，總會想起他年輕的心和如火的激情，想起「年齡裡的小小怪獸」，想起「如星的銳利的眼睛」，想起草上搖曳的綠色的火焰，想起「青草樣的憂鬱，紅花樣的青春」。當然，穆旦所呈現的遠遠不止這些。作爲一個自覺的現代主義詩人，穆旦在中國戰亂年代，主動接受西方現代派詩人的先驅人物艾略特的影響，吸納並傳承其詩歌理論，體驗並探索其荒原意識，在詩歌中溶入了「圓融的智性，沉雄的血性，幽遠的詩性」，從而成就了自己濃烈而獨特的詩歌風格，立下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里程碑。

據穆旦年譜所載，自從一九五八年被打爲「右派」後，穆旦雖內心悲苦，但並未中斷外文詩歌翻譯。他對厄運卻緘口不提，不願牽連他人，也不願受人悲憫，轉而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翻譯事業，見縫插針、夜以繼日地完成了拜倫的《唐璜》和普希金的《歐根·奧列金》等卷帙繁浩的譯著，並試圖從中探索新詩與傳統詩的結合方式。然而，這個被譽爲「這一代的詩人中最有能量的、可能走得最遠的人才」，在漫長的改造期間，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，導致詩歌創作也戛然而止。

一九七六年一月，穆旦騎自行車摔傷。雖然股骨骨折，但爲了不讓受苦的家庭雪上加霜，他竟未去醫院檢查，以至後來厄運難逃。也不知是病痛帶來某種預示，還是對隱隱曙光的熱切渴望，穆旦壓抑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詩歌創作衝動，竟在一九七六年噴薄而發，一氣呵成，成績顯著，打破了文壇所謂的「何其芳現象」（思想進步，藝術退步）。

他晚年的詩，處處預感歲月蹉跎，時日不多，流露無奈。「我已走到幻想底盡頭」，「年輕的靈魂裹進老年的硬殼」，「感到自己的心比街心更老」，「人們對我說：你老了，你老了」。靜默多年後發出這樣的嗟歎，其實是年輕的心的覺醒。生命的活力並未燃盡，對生活還是有着期望，每個低吟，都想喚起一種重拾舊日朝氣的勇氣，希望「趁這裡還燒着一點火，且讓我們暖暖地聚會。」禁錮了如此之久，在生命最後一程，穆旦向世人展示的，除了對年老的顧惜，還有他未曾放棄的理想、與故人的道別以及他早已磨礪得內斂樸實、波瀾不驚的內心。

穆旦有據可查的最後一首詩，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創作的《冬》。最初，這首詩「太悲觀」。在好友杜運燮的建議下，他改掉每組最後一行「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」，而變得婉轉。然而，無論冬天是不是嚴酷的，他還是宿命地走到人生的終點。一九七七年除夕剛過，冬天尚未告別，穆旦因爲治腿傷引發心臟病而辭世，是年六十歲。

應該承認，穆旦的藝術生涯是卓越而完整的，他的聰慧和熱情並未因困苦而止。經過歲月的煉鑄，他「老年的囈語」顯得更加洗練、醇厚、深沉，是他創作歷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容忽視。在生命最後一年，他還在魯迅《熱風》的扉頁上記下這樣一句話：「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，就像螢火蟲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」穆旦自己正是這樣做的，用盡畢生精力去點燃一盞燈，照亮了中國新詩的現代化進程。

胡喬木的一次急就章

李景賢

海外許多人也知道，胡喬木是中共的大筆桿。一九四一年初，他在延安被毛澤東選中當秘書。在長達二十年時間內，胡喬木受毛澤東之命，爲中共中央及其宣傳喉舌，撰寫了大量文稿、社論、評論、通訊稿，其中包括兩篇間接抨擊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「重磅」文章。一九六一年秋，他因患重度神經衰弱症告假，毛澤東立即照准，囑其「遷地」長期療養，「遊山玩水，專看閒書，不看正書，也不管時事」。正因爲如此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上半期，中共發表了那麼些「批修」大文章，這位「中共中央一枝筆」與任何一篇都無緣。「四人幫」被粉碎後，胡喬木爲中共中央以及鄧小平撰寫了大量重要文稿，其中有一篇專談中國與蘇聯的關係。

鄧小平的「神來之筆」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，勃列日涅夫突然病逝於莫斯科。就在二百二十天之前，即當年三月二十四日，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，選擇離中國不遠的地方公開發表講話，表達出要改善中蘇關係的願望。這篇講話被史家稱爲「勃氏絕唱」。鄧小平立即抓住這一重要信號，作出了比較正面的回應。此次，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藉勃去世之機，採取了一項新的重大外交行動。

十一日傍晚，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收到了國內就勃列日涅夫逝世事發來的三項決定：一、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唁電；二、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烏蘭夫到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弔唁；三、派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使，到莫斯科參加弔唁活動。我們很快就獲悉，這些決定都是在鄧小平的授意下作出的，後來被人稱爲他的「對蘇葬禮外交」。中蘇兩國全部人員「老死不相往來」已十多年，在這種極端反常的情況下，這是一個要「撥雲見日」的「神來之筆」。

讀了國內的來電，我和使館的同仁很振奮：幾個既令人傷感，又使人欣慰的「第一次」就要出現：我國最高權力機關近二十年來，第一次就一件非慶典事給蘇方發來電文；我國領導人十七八年來，第一次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；我國領導人十三年來，第一次與蘇聯領導人見面。

十二日上午，國內通知使館：黃華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員有四人——中國駐蘇聯大使楊守正和外交部蘇歐司的負責人。國內還讓使館派三人協助代表團工作，並指定我擔任代表團聯絡員。

胡喬木領命急「作文」

十四日清早四時（莫斯科時間，下同），黃華特使一行離開北京飛往莫斯科。六時許，國內給使館發來了黃華特使離京前在首都機場發表的書面談話。我們很快就得知，這位特使乘坐的飛機起飛後不久，鄧小平就指示立即發表個談話，並直接請被海外華文媒體譽爲「中共文膽」的胡喬木擬稿。胡喬木按照鄧小平的意思，很快就草擬出黃華特使這篇書面談話（以下簡稱「談話」）。

「談話」打印出來一看，還不到一頁A4紙，總共才五百三十二個字，但包含着十七層意思。我細細地讀了好幾遍，感到文章言簡意賅，意味深長。

「談話」稱勃列日涅夫爲「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」，說他的逝世「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」；指出他逝世前不久，「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於改善中蘇關係」，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「讚賞」。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，是鄧小平的一個「大手筆」。老人家這是藉悼念逝者之機，着眼於蘇聯老百姓，意在做蘇共新領導人的工作。

「談話」還有兩個生花的妙筆。一個妙筆是，文內有這樣的提法：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後，中蘇關係惡化「達到了嚴重的地步」。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這是有意摁下的一個「軟釘子」，暗示正好在這一時期執政的勃列日涅夫，應對兩國關係的「嚴重」「惡化」承擔責任。這句話綿裡藏針，巧妙地體現出鄧小平關於對勃「不能光說好話」的指示精神。另一個妙筆是，「談話」末了有這樣一句話：「希望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和蘇聯黨政當局作出新的努力，促使中蘇關係得到逐步改善。」這裡邊一個「總書記」，一個「黨政當局」，箇中話裡有話，暗含着經過十六七年後，對蘇聯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重新公開承認。中共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，就開始對蘇共進行大批判，而且越批火力越猛，一批就是二十年。鄧小平這位當年與蘇共領導人面對面進行大論戰的主角，現在把筆鋒一轉，大概是想讓蘇共新領導人聽出點弦外之音。

當日上午十一時，楊守正大使早早就來到了莫斯科機場貴賓室，等候黃華特使的到來。大約過了二十分鐘，蘇聯副外長伊利切夫也來了。他一見面就高興地對楊大使說：那份文件（指黃華特使離京前的書面談話）已經看到了，寫得「很正面」，對它的評價自然也就「很正面」。伊利切夫還半開玩笑地說：「大使若是允許提意見的話，我就冒昧說兩點。」楊大使頗感興趣地說「請講！」於是，他從上衣口袋裡摸出一張紙片（估計是塔斯社用俄文轉發的「談話」稿），指着一個地方說：「文件」中「祝願蘇聯的建設事業日益發展」這一處，「建設」一詞顯得禿了一點，前面如果加上「社會主義的」這樣一個形容詞，那就更好啦！又說，「文件」中只有一個地方用了個「黨」（指蘇共）字，在別處如能再用一兩次，那就錦上添花了！這個老外交把兩點意見說完後，瞇着眼望着楊大使，似乎覺得自己「點中」了「要害」。看他這副得意的樣子，我不由得會心一笑：這塊「老薑」好「辣」！

十二點十分，黃華特使一來到機場貴賓室，楊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請到一邊，彙報了在北京發表「書面談話」一事。他聽到後先是一愣，說：「哦，原來還有這麼回事，我上午離開北京之前發表了個『書面談話』」！看了一下我交給他的「談話」稿後，他又立即說：「小平同志的決策眞英明！喬木同志的文章寫得眞好！」我陪着楊大使站在這位特使的身旁，明顯可以感覺得出來，他對鄧小平又一「神來之筆」感到非常振奮。

胡喬木這次受鄧小平之命所做的急就章，倒是勾起我對一件往事的回憶：毛澤東爲胡喬木本人也做了一次急就章。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談話，說什麼「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併」。斯大林對此很惱火，向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提出，蘇中雙方各自發表一項官方聲明，對艾奇遜的談話進行駁斥。毛澤東表面上雖然表示同意，但內心卻另有打算，他當時想起了遠在北京的胡喬木，決定以他那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篇談話。十九日，毛澤東給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，發回只用了三四十分鐘寫就的「胡喬木談話稿」，挖苦美國「國務院的老爺們因感覺自己的賭博快要輸光了」，痛斥艾奇遜之流一天「不乞靈於最無恥的謠言」，一天「就不能活下去」。這篇長達一千五百多字的稿子，次日即由新華社全文播發。這眞可謂：一個大「筆桿」的「文字」，由另一個更大的「筆桿」「捉刀」，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奧妙處之一。斯大林對毛澤東「言聽而計不從」的做法甚爲不悅。其實，這位蘇聯領導人並不懂得箇中奧妙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毛澤東，感到「官方聲明」會讓他束手束腳，罵艾奇遜之流罵得不夠痛快，只有通過新聞官員的嘴，才能將其譏諷得酣暢淋漓。

知情者揭秘

去年底，一位知情者多次與我長談，主題是鄧小平的「對蘇葬禮外交」，我從中了解到一些鮮爲人知的細節。譬如，對於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那個「勃氏絕唱」，鄧小平當着黃華的面交代：外交部要立即作出反應，用外交部發言人的形式向中外記者表態，要講得言簡意賅（這一表態發表時總共只有三句話，七十七個字），掌握分寸，既要堅持原則，又要有靈活性，不拒人於千里之外。

又如，中國國務院一位領導人，考慮到黃華赴蘇聯參加葬禮有「中國特使」這樣一個特殊身份，又肩負着鄧小平的重要使命，況且當時北京——莫斯科之間的航班很少，不便於往返時間相銜接，便提出破例派蘇波音七三七專機送黃華去參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禮。鄧小平同意了這一提議。不過，黃華覺得，十一月十四日一早，有中國民航班機去莫斯科，中午即可抵達，趕得上當日晚才開始舉行的悼念活動。於是，他就決定坐班機去，給國家省點外匯。對此，他向上述那位領導人作了報告，但沒有驚動鄧小平，覺得這樣做並無什麼不妥。十四日上午十點左右，鄧小平參加完一個會議之後，對身邊的人員說：「黃華同志坐的專機今天起飛之前，請他發表個書面談話。」他身邊的人員說：「黃華同志爲了給國家省點錢，不願坐專機，而改坐我國民航班機去莫斯科，一個小時以前就已經起飛了。」鄧小平立即請當時正好在身邊的胡喬木擬稿。像往常一樣，鄧小平只點出文章的主旨，三言兩語交代需寫的要點，給撰稿人留出很大的寫作空間。胡喬木對鄧小平的指示心領神會，只用了半個小時便交出了稿子。此稿經鄧小平修改後，即以黃華特使「離京前」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的形式播發。胡喬木對鄧小平的用意領會之透徹、對當時複雜而微妙的中蘇關係理解之精細、「談話」稿遣詞造句之貼切，實在令人讚歎！

再如，在上述「談話」中，稱勃列日涅夫爲「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」；說他的逝世「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」；提出「希望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和蘇聯黨政當局作出新的努力，促使中蘇關係得到逐步改善」。這幾層意思意存高遠，表明鄧小平正在謀劃一個將震驚世界的決策。

抄襲比盜版可恥

然 也

這個標題是「抄襲和盜版」二〇〇九年九月四日《南方都市報》B02版「今日娛論欄目」的標題。只是用兩句話來回答他的問題：

第一句：抄襲是謀財害名。

第二句：盜版是謀財揚名。

十幾年前，筆者讀過一篇長篇通訊，是說抄襲的。

抄襲者開始是謀財害名，就是把別人的文章當成自己的文章投稿。有個抄襲者抄的是譯文，原譯者知道後去信批評，抄襲者還振振有辭地回信：難道全國只有你一個人懂外語！有個傢伙認爲抄短文不過癮，跑到縣城買了一擔舊雜誌回來抄中長篇。

後來，抄襲者們學聰明了，只抄文章不改署名，把作者的通訊地址改爲自己的住所，聯繫人寫他自己，這樣就是被作者發現了，也只是埋怨報刊轉載沒有跟他聯繫，且不付稿費（現在稿費問題不能全責怪報刊，因爲報刊轉載都把稿費上交國家版權局，國家版權局是否轉給作者那是他們的事，與報刊無關），沒想到被「盜版」了。當抄襲、盜版成了產業，有人買了打印機，採用流水作業，自己打印別人的文章，老婆寫信封，母親貼郵票，兒子黏封口，然後一麻袋一麻袋地寄往全國各地報刊，連縣級廣播站也不放過。眞是盜版成堆，抄襲成風。近來更方便，從網絡下載文章用電子郵件群發。

以前有人抄了一篇劉心武的中篇小說投稿，不料編輯讀過劉心武這篇小說，而通訊地址卻是某省農村的，知道是「盜版」的，便寫信去批評。盜竊稿件的人恍然大悟，說，今後凡是姓劉的就不要抄了。

而筆者不姓劉，也沒有什麼名氣，出了幾部書也沒有什麼市場，假如忽然有人盜版，一印再印，雖然版費被盜版的人賺去了，但筆者一下子名氣大增，成了暢銷書作者，說不定明天就會有出版商來找筆者簽約，何樂而不爲？盜版是謀財揚名，我們還要感謝人家呢。

而抄襲就不同。辛辛苦苦寫出來的文章被人抄襲了，不但稿費拿不到，連署名、版權也是別人的。甚至會造成少數不明眞相的讀者還認定原創作者是抄襲者，那不是不但財被謀了，連名也被害了嗎？

所以說，抄襲比盜版可恥。

「不撒謊」，能持否？

陳魯民

在二〇〇九中國科協年會「科學道德建設論壇」上，每位與會人員的資料袋裡，多了一本《科學道德規範手冊》，手冊中包括《致全國科技工作者倡議書》和《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範》。整整一天時間，二十餘名兩院院士和美國科學家展開了激烈討論，一起會診當前頻頻爆發的「學術不端流感」

論壇上，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的「把脈」言辭犀利，他歷數當下科學界存在的十三種違反學術道德的不端行爲：論文造假、抄襲愈演愈烈；靠拉關係爭項目和經費；評審成果造假；僞造學歷及SCI引用查詢證明；報獎搞包裝、搞運作；爲應付評估檢查集體做假；搞「應試科研」；部分科技管理部門把管理權力利益化等。

全國政協副主席、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開出的「藥方」則只有三個字「不撒謊」。她說，「我母親是位極平常的中國老式婦女，她對我們最早最早的教育就是三個字——『不撒謊』」。「不撒謊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底線，而這個榮與恥的區別，要從娃娃開始抓起。科學界自然要首先做到，科研工作者要成爲大衆表率。

的確，目前科學界、學術界出現的各種「學術不端」現象，從根子上來說，都是在「撒謊」，抄襲和「過度引用」是論文撒謊，成果造假是實驗數據撒謊，僞造學歷是學歷撒謊，一字不寫卻強在別人成果上署名是署名撒謊，博導、教授出了事情把責任都推給副手或學生是道義撒謊，還有評獎撒謊，評職稱撒謊，應付評估檢查撒謊……可見，要整肅科學紀律，也不要提太高的道德要求，只要能堅決做到「不撒謊」，那些烏七八糟的學術不端現象就都不會發生。所以，學界要抓科學道德教育，要嚴肅科學道德規範，其實也不必列那麼多條條框框，就從最基本的「不撒謊」做起。這個標準看似不高，和幼兒園孩子的要求差不多，但不妨問問，那些論文造假、抄襲成風的醜事，不都是出自我們一些長鬍子的成人之手嗎？在這一點上，他們確實連娃娃都不如。

二〇〇一年四月十六日，朱鎔基總理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，應邀給會計學院題寫校訓，他既沒有豪言壯語，也沒有旁徵博引，就題了四個大字「不做假賬」，擲地有聲，語重心長。有人以爲這四個字過於直白，其實這正是抓住了時下財會人員存在的主要問題，也是最基本問題。八百多年前，岳飛也有一句名言：「武將不怕死，文官不愛錢，則天下太平矣。」不妨套用一下：學者不撒謊，博導不造假，則學界清淨矣。因而，以後若有人要投身學界，涉足科研時，我們很可以學學和尚受戒時的那種嚴厲審查，由德高望重主持者正色問道：不撒謊，不造假，能持否？如果表示做不到，或者吞吞吐吐，言不由衷，那就請走他門。

獅山聽湖

許 鋒

在北方少見水，北方有黃河，但黃河是偉岸了一些，不像湖那麼小家碧玉，所以心裡還是格外喜歡湖。再說，只有湖是寧靜的，是適合於旅人的。我一直當自己是旅人。我從北方出發，一路南行，然後循着湖畔停滯下來，但心還在遊走。

南方的湖，和北方的山丘一樣多，那些湖像擱淺的小舟，像沉寂的大粗碗，也像心之琴弦，你不去碰它，它就那麼在密集或疏鬆的林間靜謐地存在着，不慍不火，不微笑，也不惱怒，卻不是面無表情的，像一個小小的女孩，偶爾也頑皮，偶爾也嬌氣，偶爾也不安分。

我原來想，要是住在湖邊該多好，或者窗正對着湖，天晴時有時乾脆望着湖發一會呆；或者在清晨，人家都沒醒來時，先抓住一點時間，望望湖，靜坐下來，寫一點閒散的文字，感覺應該不錯。但在城市，那樣的風景是稀缺的，人的貪婪有時不在心裡，全在眼裡，想獨佔一片湖面，像獨霸一方山水，於是望海的、望河的、望湖的，哪怕是望水的房子，都貴，不是我等養家餬口的人所有力氣拿下的。但有的水景，卻眞是人造的，挖個碩大的坑，排入自來水，剛開始是唬人的，若是眞住過去，要不了幾個月，水就會因阻滯而頹喪得腥味兒撲鼻了。

我現在卻是「富有」的，這個位於廣東佛山南海的叫獅山的小鎮，居然有那麼多的湖，懶懶散散地分布在我的視線之內，有時就一齊要開了小性子，有些清晨幾乎令人「窒息」，什麼也看不見的，全都是霧，濃厚的霧，沉悶的霧，如同北方鬧騰人的沙塵暴。霧裡的該都是細密的水珠，沾了人的頭髮，衣裳，也湧進了房子，上了牆，進了櫃子，便都是潮氣了。這樣的天兒，人和衣物便整個如水「洗」似的。

霧裡是看不清人的，好在獅山大學城的清晨車很少，否則眞是難行。我穿梭在霧裡，呼吸着霧，如處身於一個仙境，渾身通透——那情景要是移植到北方，該是令人驚訝得合不上嘴的。那麼多的湖因何而來，因何而生？是自然的寵兒？卻再也無法歡暢地遊走。是棄兒？卻心如止水，平靜而幽遠。是仙人一揮衣袖肆意撒下的？眞是樂善好施。

我喜歡走路。一路走着，看着湖，到處都是青山綠水，一年四季都是青山綠水，除了霧天，湖面沒什麼變化。我與它離得很近，在沉寂的清晨，除了小鳥的啼叫，便就是它的聲音了，我幾乎能聽到它的聲音，深邃的，靈便的，舒緩的，水的包容之聲，瓦解之聲，分離之聲，或者純粹的磨合之聲。還有魚游弋的聲音，有各式的微生物發出的顫鳴，沒有蛙叫，暫時也沒有蟬聲，或者在我聆聽湖聲時，忽視了、忘記了頑皮的蛙與不甘寂寞的蟬吧。

湖水綠得濃郁而熾烈。有些淡淡的霧還在湖面上空盤繞，像一條蜷曲的龍，像旋風，演繹着不同的造型。我一邊聽着湖，一邊走路，就能看見早讀的孩子，其實他們不算是孩子了，是大學生，在讀英語單詞，樹下，湖畔，人行道上，但不多，甚至是偶爾才有，我就惋惜，這麼好的風景居然無人欣賞——也許對於南方來說，沒有什麼風景不風景，自小到大，從早到晚，都是如此的景色，膩了，煩了，不像我這個北方人，經見的雨水少，把一點水塘也當作風景。

再路經那些湖時，由於熟悉了，便也不去刻意看了，但是在聽的，聽它的心跳——湖最是寂寞的，它如孤獨的旅人，有時也渴望與路人結伴而行，卻因爲矜持且孤傲，而漸漸地故步自封，繼而愈發自閉，愈發孤芳自賞了。

湖最可愛的地方，是令人瞬間便寧靜下來——與海、與江、與河是完全不同的。適合旅人。